

纸介汉语教材调查报告^①

贾 琳 王建勤^②

〔摘要〕 本文首先总结了国内纸介汉语教材的编写现状,通过对 2005 年之后出版的《新实用汉语课本》、《长城汉语》、《博雅汉语》、《体验汉语》、《初中级汉语视听说教程——中国百姓身边的故事》、《中高级汉语视听说教程——走进中国百姓生活》等教材进行考察,分析目前教材编写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

〔关键词〕 汉语国际推广;纸介汉语教材;编写理念

An Investigation on Chinese Textbooks

Jia Lin & Wang Jianqin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rinted editions of textbooks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published in mainland China between 2005 and 2009. It discusses how Chinese text-books should accommodate the overseas teaching environment. Four principles are proposed to guide the process of textbooks writing.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textbook; principles of writing

一、引言

自 2005 年我国实施汉语国际推广战略以来,汉语教材的数量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增长。据本项目组调查,包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华语教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等传统汉语教材出版大户在内,国内现共有 116 家出版社从事汉语教材的出

①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2006 年度重大项目(06JJD740004)的资助,同时得到北京语言大学校级规划项目(06GH02)的资助。

② 作者简介:贾琳,北京华文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对外汉语教学;王建勤,北京语言大学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对外汉语教学。

版工作。截至 2009 年秋,我国出版的纸介汉语教材已达 2 772 种,其中 2005 年之后出版的教材约占总数的 40%。现有纸介汉语教材中,语言类教材占 68%;文化类教材占 14%;特定目的类教材占 18%。

然而,与庞大的出版规模和激增的出版数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编写的纸介汉语教材在海外的使用量还不及国内出版总量的 1/20。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汉语教材走不出国门呢?是教材质量问题还是教学观念问题?抑或是其他?在汉语国际推广面临“三教”难题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和探讨。

二、纸介汉语教材编写现状和海外使用现状

(一) 纸介汉语教材出版数量与种类的变化情况

1. 数量增长情况

据统计,截至 2009 年秋季,国内正式出版的纸介汉语教材达 2 772 种,其中 1980 年至 2005 年共出版 1 685 种,而 2006 年至 2009 年四年间就达 1 087 种。^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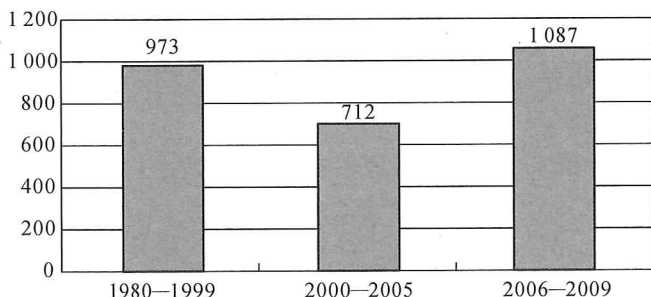


图 1 1980—2009 年纸介汉语教材数量变化情况

2. 种类变化情况

与 2000—2005 年出版的汉语教材相比,2005 年之后教材的种类构成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具体表现在:

- (1) 分技能课教材数量减少;
- (2) 关于中国文化历史方面的汉语教材明显增多;
- (3) 特定目的类教材激增。

^① 数据来自北京语言大学图书馆对外汉语教材(中国出版)数据库,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华语教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年对外汉语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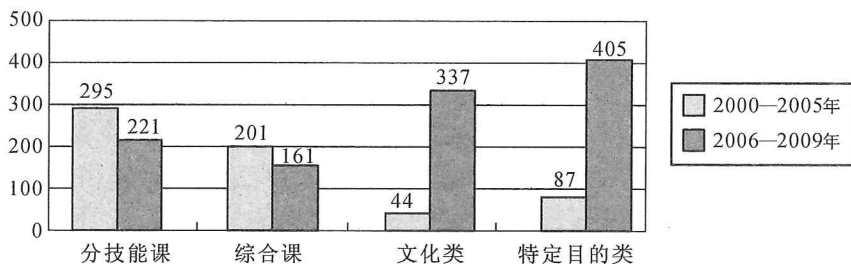


图2 2005年前后纸质汉语教材种类构成情况

注：分技能课教材包括听力课、阅读课、口语课、写作课、翻译课教材；特定目的类教材包括商务、旅游、生活、留学、医学、HSK 考试教材。

（二）教材编写质量、编写方法和编写观念上的变化情况

1. 编写质量上的变化

（1）2005年之后出版的教材在版式设计上都比较讲究插图，装帧精美、图文并茂、形式活泼。采用四色印刷，采用大量卡通画、功能性图片和实景照片，帮助学习者熟悉真实的语境，场景自然，人物形象饱满，使课文内容更加真实、生动。辅助教材形式多元化，除传统的教师用书、练习册外，主干教材还配有MP3光盘、CD光盘、电子教案等多媒体辅助工具。

（2）课文编写质量和练习设计质量进一步提高，出现了以主题话题为线索编排的课文，话题涉及经济、文化、体育、伦理等领域，展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人物的活动贯穿始终，人物个性鲜明，情节生动有趣，充满生活气息。注重功能和话题，让学生有话可说，能深入交流和扩展；在课堂操练上，注意借鉴任务型教学的成果，让学生带着真实的任务去练习。

2. 编写方法上的变化

形式上，2005年之后出版的教材在编写体例上有了新变化，比如在语法注释的处理上，提高了对用法的重视。练习设计比较活泼，形式更加多元化。教材的容量不显得厚重；版式设计也比较活泼。内容上，在课文选材上更加现代，贴近当代生活；语言比较活泼；注意应用性和趣味性。

3. 编写观念上的变化

国家提出汉语国际推广战略之后，编者注重借鉴最新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和教学理论，并在教材前言中有所体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 （1）以培养学习者汉语交际能力为主要目标；
- （2）以功能为纲，淡化语法；
- （3）注意借鉴任务型教学的成果，让学生带着真实的任务去练习，在做中学，在用中

学,在体验中学;

(4) 为学习者提供真实交际情景和完全符合语言学习规律的的学习材料。

令人遗憾的是,理论上的认识并没有在教材编写中得以贯彻实施。我们在“听其言”的同时,更应该“观其行”,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教材编写所反映的教学观念和学习观念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三) 海外纸介汉语教材使用现状及需求分析

1. 海外使用现状

(1) 汉语教材使用混乱。东盟各国使用的汉语教材种类比较多,有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等地的,有当地政府与中国教育部门合作编写的,也有根据本国实际情况编写的教材。由于教材种类的繁多,各国在教材的使用上存在一定的混乱性。

在加拿大,不同中文学校使用的教材不统一,教材来源各不相同,且内容不适合加拿大学生的需要。主要使用的汉语教材有些是澳大利亚版的,例如《你好!》、《汉语》、《中国通》;有些是国内编写的教材,但版本陈旧,例如《实用汉语课本》;另外还有少量当地教师自编的教材,虽然教师的自编教材加入了相对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的教学内容,但教材缺乏系统性、完整性。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与加拿大情况相似,缺乏本土化的教材导致教材乱用的现象发生。

(2) 多使用由本国教师编写的汉语教材。在美国,现有将近 30 万的汉语学习者,预计 2015 年将增长到 300 万人,北美汉语教育市场如此广阔,但北美汉语学习者所使用的教材大都是由北美出版社发行的,且大都是北美当地的教师编写。主流汉语学校使用的教材大体有十余种,其中只有 3 套教材是我国国内出版的,分别是《新实用汉语课本》、《快乐幼儿华语》、《快乐儿童华语》。在澳大利亚,随着华人移民数量的增加,学习中文在澳洲已经形成风气。但是在澳洲使用的汉语教材大都是由澳大利亚当地出版社出版。在日本,主要汉语教材的出版社基本是日本的出版社,共有 20 家。

(3) 中外合作编写的教材较少。在韩国,市面上流通的汉语教材有 400 多种,最畅销的汉语教材是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的《汉语口语速成》和《汉语会话 301 句》。这些流通的教材虽然大都是中国出版的,但有些是在中国出版后根据韩国当地的情况被译成韩文,有的则经过编辑后出版以符合韩国人的口味需求。

2. 需求分析

(1) 有针对性的国别化教材亟待开发。东盟各国目前急需的是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贴近当地人思维和生活习惯的“国别化”汉语教材。

(2) 中外合作编写的本土化教材亟待开发。在这方面我国以开拓欧洲汉语教育市场为目标编写了一些针对欧洲国家汉语学习者使用的教材,但与现实的市场需要仍有很大差距。

三、现有纸介汉语教材存在的问题

(一) 课文内容脱离实际,语言枯燥乏味

在课堂教学中,课文是语言输入的主要来源。课文内容的编排直接影响着学习者能否得到充足、理想的语言输入。在第二语言习得领域,语言输入是指那些具有某种交际意图的语言(Bill Vanpatten, 2007),这就要求课文内容应该为学习者提供真实的语言交际情景和具有现实交际意义的语言材料。目前,汉语教材中的课文多是围绕某几个句型或语法点编造而成,将一些毫不相干或是极不自然的句子拼凑在一起,如“我们家没有小狗。林娜,你有没有男朋友?”不少教科书中的对话像审讯中的一问一答,绝非正常人的交谈,完全脱离现实(佟秉正, 1991)。

(二) 语法项目重形式,脱离语义、语用

1. 对语法规则的讲解过于详细,缺乏实用性

大多数汉语学习者学习汉语的目的是为了拥有汉语交际能力,而不是成为语言学家。语法规则属于显性语言知识,在学习者语言习得过程中只起到辅助性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并不等于隐性语言知识。好比一个腿受伤的人,用双拐支撑避免伤腿移动,以帮助伤腿恢复,但是,当这个人的腿伤好了以后,我们不能说是双拐治好了他的腿,更不能说双拐变成了他的双腿,我们只能说双拐促进了伤腿的回复过程(Bill Vanpatten, 2007)。同时,把语法当做知识来讲授,容易引起学生的反感(Larsen-Freeman, 2001)。目前,教材中的注释详细讲解语言结构、语法知识和组词造句的规则,并津津乐道于语法术语的讲解,如对“双宾语动词谓语句”等专业术语的讲解。

2. 忽略用法和使用场合

学习者的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包括语法能力(grammatical competence)和语用能力(pragmatic competence)(Thomas, J., 1983)。注释中关于词语用法和其使用场合的说明对于培养学习者的语用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而现有教材中的注释多为语法结构的讲解,如语言点“跟……似的”,注释如下:“似的”是助词,用在名词、代词或动词后,表示跟某种事物或情况类似。首先,我们认为“‘似的’是助词,用在名词、代词或动词后”这句话对学习者的帮助并不实际;其次,这条注释没有讲解这个语言点的用法和使用场合。按照注释,我们完全可以将其与“像……一样”等同。在教材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拘泥于繁琐的语法而忽略用法是舍本逐末的做法,不利于培养学习者的语言交际能力。

3. 语法规则的讲解缺乏针对性

目前,针对不同国家的汉语教材中的注释的区别局限于翻译语种的差别,而忽略学习

者母语迁移所造成的影响和学习者母语文化背景带来的认知风格上的差异。

(三) 练习设计以机械操练为主,忽略意义理解和用法练习,缺乏交际性

练习作为学习者语言输出的形式之一应该以表达某种意义为目的,不能为了输出而输出,更不能强迫学习者超越现有水平实现语言输出,所有的输出在本质上都应该是交际的(Bill Vanpatten, 2007)。而现在的教材中的练习设计以替换、句式转换等机械操练方式为主,只注重语言形式,不关注意义。李泉(2006)指出有些教材虽然主张结构与功能或结构与功能与文化相结合,但实际上并未脱离对语法点和句型的反复操练,只是在使用这些结构时才会想到功能,实际上功能只是附属品,同时,功能项目的选择随意性很大,缺乏系统性。Long(1996)指出,“互动环境是通过选择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和学习者发展中的第二语言加工能力来促进第二语言习得的。”而现有教材中的互动练习多以一问一答这种完成句子的形式出现,缺乏交际性,不能促进学习者对于语言结构意义的关注和加工,无助于学习者隐性语言系统的发展。

(四) 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结合不紧密

在很多情况下,第二语言学习者因为缺乏对目的语社团文化的了解而被目的语社团成员视为不礼貌甚至粗鲁。例如,在俄罗斯,香烟是一种免费物品(free goods),因此陌生人之间相互索要香烟是很正常的,可想而知,当俄国人向一个陌生中国人要一根烟抽的时候,那个中国人会多么“惊讶”(王建勤, 2009)。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渗入语言材料之中。文化教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现有教材多以“文化知识”等专栏进行中国文化知识的普及,但是,文化不仅仅是几个民俗节日,也不仅仅体现在风俗习惯上,文化是一种理念,是体现在有形的文化产品与文化活动之上的无形的文化观念(陈敏, 2006)。在网络发达的今天,学习者无论身在哪个国家,都能够很轻松地获得文化知识的相关信息,而如何处理、加工这些信息是外语教学今后应该关注的焦点。文化教学重点不是传授文化知识,而是培养文化能力,培养跨文化理解与交流的能力,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培养开放、尊重、宽容的跨文化态度(何琳, 2007)。因此,对于文化知识的展示并不能促进学习者社会语用能力的发展,解决学习者在目的语文化语境中“说什么”“怎么说”的问题。

四、对于上述问题的理论思考

(一) 遵循听说法的教学理念,教学观念

虽然许多教材在前言部分都声称“以培养学习者汉语交际能力为主要目标”“以功能为纲”,但在教材编写中并没有得到贯彻。教材的编写依旧遵循听说法的教学理念。该教学法的语言理论基础是结构主义,心理学理论基础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它强调与目的语的大量接触和实践,强调语法结构的操练(束定芳、庄智象, 1996)。行为主义学派把学习看成是刺激——反应的过程,通过不断的外在刺激,学习者就能在大脑中逐渐形成对刺激

物的反应,从而将其掌握。在这种教学观念指导下,教材编写重结构、轻意义;重语法、轻用法;重操练、轻交际;重输出、轻输入。

(二) 忽略学习者隐性语言系统的建立

语言习得与语言规则的学习是两个不同的过程,语言规则的学习是显性语言知识的获得,而语言习得只能通过受隐性语言知识支配的能力获得(Bill Vanpatten,2007)。“书到用时方恨少”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显性语言知识和隐性语言知识的关系,因为显性语言知识是语法规则,学习者遇到没有学过的语言点或在没有练习过的交际情境下,语言表达就会出现语言交际的偏误。比如,汉语动态助词“了”的语义特征的描写,是语法学家们面临的一个难题,对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是一个学习的难点。但是,并不是因为语法学家们没有描写清楚,学习者就不能习得“了”的语义特征(王建勤,2009)。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研究表明,运用传统的语法教学方法并不能促进语言的获得,原因是机械操练并不能促使学习者对语言输入进行加工。语法教学使学习者获得显性语言知识,行为主义学派希望通过操练将学习的知识转化为习得的知识,而克拉申认为习得的知识和学习知识是相互独立的两种知识,二者是无法转换的。

(三) 违背语言输入大于语言输出的原则

语言输入的重要性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没有语言输入,语言习得就不可能发生。Bill VanPatten(2007)认为语言习得是作为理解的副产品而自然发生的。教师用于规则展示的语言不是语言输入,因为这些语言仅仅是通过举例来说明规则,而不是为了交际。同时他指出语言输出是指学习者生成表达某种意义的语言。也就是说,那些通过机械操练的模仿,没有实际交际目的的语言输出对第二语言习得是毫无意义的。

目前教材的练习设计要求学习者“学多少,会多少”,也就是要求输出等于输入(胡明扬,1999),而学习者的输出只是对例句的模仿和重复,缺乏交际目的,不但违背了语言输入大于语言输出的原则,而且由于缺乏对语言输入材料的加工,并非有效的语言输出。

五、解决教材编写问题的对策

(一) 转变教学观念和学习观念,以习得为导向,强调内隐学习

Reber认为,内隐学习具有自动性、抽象性和理解性。所谓“自动性”是指内隐学习是自动发生的,无需有意识的学习和发现语言的规则。所谓“抽象性”是指学习者获得的隐性语言知识是抽象的,是可以迁移到新情境中同类结构知识的获得过程中去的。所谓“理解性”是指学习者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利用隐性语言知识。语感就是通过一种直觉的方式运用隐性语言知识的一种表现。当外国学生说“我把飞机坐到我们国家去”,母语者会凭借语感或以语言直觉的方式来判断这个句子的合法性。原因是母语者具有判断句子合法性的依据,即隐性语言知识。第二语言学习者同样需要依据这种隐性语言知识去判断句子的合法性,而这种知识的获得只能通过内隐学习的方式来获得,特别是那些复杂的语法

规则(王建勤,2009)。第二语言学习者通过内隐学习的方式会自动地获得复杂的语言规则,而且具有非常高的学习效率,这是外显学习所做不到的。

(二) 提倡功能性操练和互动练习,注重学习者交际能力的培养

功能性操练又叫交际性操练(communivative drills),属于有意义的操练,答案由学习者来控制(Bill Vanpatten,2007)。功能性操练强调互动,有助于学习者交际能力的培养。曾妙芬(2005)在报告中给教师们提供的一个样课上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设计。这节课老师要教会学生们运用“……先……,然后再……”、“……以后,就……”、“上完……课以后,就去……”、“各……(不)一样”、“……比……+adjective”等几个句型,采取的办法是:前一天教师把一周上课时间表发给学牛,请学生在家把星期一到星期五上什么课、什么时间上课写下来。在表格中,事先列出准备的问题,如:

你这学期一共上了几门课? 是什么课? 几个学分?

你每天都有课吗? 分别是什么课?

你哪一天课最多? 哪一天课最少? 是什么课?

你星期一到星期五,哪几天上的课一样? 有什么课?

你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什么时间上课?

你最喜欢什么课? 最不喜欢什么课? 为什么?

上课时,把讲义发给学牛,让学生两人一组讨论,轮流回答上述问题。请学生报告自己的时间表,老师问问题,并检查语言使用的问题。从这个设计中我们发现学习者的语言输出是建立在对语言输入的加工的基础上,在理解意义的基础上将注意力集中在句型上。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不仅学会了如何用汉语讲述出某一方面的情况,也学会了汉语的几个主要句型。

(三) 提供真实的语言交际情景,为学习者提供充足的语言输入

语言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能够使用所学语言进行交际。因此,学生学习的语言应该是实际交际中使用的语言,而不是想象或虚构的语言。所以,外语教材选择或编写的语言素材必须与现实使用的语言基本一致,也就是说,教材涉及的语言现象应该是真实、地道的(程晓堂,2002)。以《中高级汉语视听说教程——走进中国百姓生活》(2006)为例,教材所选短剧大部分题材源于日常生活,为学习者提供了真实的言语交际情景,语言以口语为主,语言真实鲜活,为学习者提供了充足有效的语言输入。

(四) 加强文化教学,注重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语言教材中导入文化因素的目的并非只是向学生灌输文化知识,而是培养宽容的文化态度,培养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好的教材对于文化的阐释不是告诉学生“什么是什么”,而是要培养学生根据这些文化素材去理解中国文化的能力(陈级,2006)。在教材中可以有意地设计一些人物的冲突和跨文化交际中产生的磨擦,来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同时培养应对文化冲突和摩擦的能力(何琳,2007)。以《初中级汉语视听说教程——中国百姓身边的故事》(2008)为例,该教材以系列短剧《身边的故事》为脚本,共包括20个短

剧,这些短剧反映了北京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中国家庭成员、工作单位的同事,以及社会上不同关系的人之间如何相处,学习者可以从中了解中国人对上述种种人际关系的看法。

参考文献:

- [1] 陈绶. 2006. 对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的反思——AP 汉语与文化课及美国教学实况给我们的启发. 语言文字应用, (1).
- [2] 程晓堂. 2002. 关于《英语课程标准》的几点认识. 教学月刊(中学版), (11).
- [3] 何琳. 2007. 从初级教材看对外汉语教学理念的发展. 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4] 胡明扬. 1999. 对外汉语教学基础教材的编写问题. 语言教学与研究, (1).
- [5] 李泉. 2006. 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6] 刘月华, 李金玉, 刘宪民, 葛良彦. 2008. 初中级汉语视听说教程——中国百姓身边的故事.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 [7] 刘月华, 刘宪民, 李金玉. 2006. 中高级汉语视听说教程——走进中国百姓生活.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 [8] 束定芳, 庄智象. 1996. 现代外语教学: 理论、实践与方法.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9] 佟秉正. 1991. 初级汉语教材的编写问题. 世界汉语教学, (1).
- [10] 王建勤. 2009.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1] 曾妙芬. 2005. AP 中文课程设计及教学法.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12] Bill VanPatten. 2007. 从输入到输出——第二语言习得教师手册.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13] Larsen-Freeman. 2001. 第二语习得研究概况.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14] Long, M. 1996. The role of the linguistic environmen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Handbook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 [15] Thomas, J. 1983. 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 *Applied Linguistics*, (2).